

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智利道路探析

齐传钧

内容提要：“中等收入陷阱”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是真实存在的。文章通过对智利的历史经验回顾指出，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及早并持续地进行经济转型，这就需要有一个相对强势的政府来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并把“好”的制度最终固化，形成新的“路径依赖”。毫无疑问，加快经济转型也是中国未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之举，但同时必须对未来发展形势做出判断，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合理规划并布局，选择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转型 既得利益 智利

中图分类号：F1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18)04-0131-08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由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指的是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在原有经济发展方式下积累的矛盾不断累积，而经济转型却陷入失败或没有及时完成，导致经济增长波动加剧并陷入停滞，最终无法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不乏其人。实际上，对“中等收入陷阱”本身的真伪性判断是由概念理解上的差异造成的，只有去伪存真，才能揭示其中的本质含义。目前，各种误读很多，但主要有以下两种错误认识值得一驳。

一是认为世界银行指的是拉美和东南亚地区存在的一种现象，尤其是拉美地区涉及国家众多，致使过去一度错误地被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就等同于“拉美现象”或“拉美陷阱”，即把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社会动荡、信仰缺失等政治和社会现象也作为其主要特征，从而把概念无限泛化但又视为一个地区独有的现象。因此，否认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规律性和一般性，自然就认为这是个伪命题。

二是认为世界银行强调的是经济增长波动并陷入停滞，使人误把“中等收入陷阱”仅仅理解为经济危机或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那么毫无疑问，不仅在中等收入阶段存在这些现象，而且在低收入或高收入阶段也会出现这些问题，那就无所谓“陷阱”了，因为这是每一个市场化国家都会经历的经济现象。正如普里切特和萨默斯所说的，一个经济体在经过高速增长后，如果发生了经济危机或增速因为向均值回归而放缓，那么无疑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Pritchett & Summers, 2014）。但是，这显然这并非“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含义。

事实上，世界银行给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有明确指向性的，即只局限于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这个特定阶段的长期经济增长问题，解决的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为什么不再向发达国家接近或收敛的问题，或者说为什么无法突破不断提高的高收入阶段的下限标准（这个不断提高的下限标准基本上反映了美国、日本和欧洲等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因此，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关键是经济增长是否会出现长期停滞或相对停滞，而不是局限于经济危机是否发生或经济增长是否放缓。

作者简介：齐传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其实,“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本身是有理论支撑的。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因为受到要素边际收益递减和技术外生的假定制约,发达国家增长将会最终停滞,而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出却可以向发达国家收敛,最终与发达国家基本持平。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发达国家经济还在继续增长,且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均产出差距非但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持续扩大。这便有了20世纪80年代新增长理论的出现,重新对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率低于发达国家做出解释。显然,“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不过是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不仅在现实中而且在理论上都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如何避免或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呢?其实在世界银行提出这一概念的同时,已经给出了答案,即在原有模式下,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及早完成经济转型,而不能沉迷于已有发展模式或受制于短期增长压力甚至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希望只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来再现辉煌。在拉美地区,曾经的“巴西奇迹”、“墨西哥奇迹”最终都昙花一现便给出了最好的证明,这些国家在创造各种所谓“奇迹”的同时就没能及时实施或最终完成经济转型。与之相比,同属拉美地区的智利却走出一条充满争议的道路,尽管其经济转型过程(伴随着军政府的威权统治)中充满了人道主义上的争议和几代人的痛苦回忆,而且未来经济增长也未必一帆风顺,甚至还可能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至少从技术上说,智利从2012年开始便正式走出“中等收入陷阱”^①。不仅如此,2010年1月11日,智利与OECD签署协议,正式成为该组织第31个成员国,也是拉美继墨西哥之后第二个加入该组织的国家,意味着智利从此进入“富国俱乐部”。而且,世界经济论坛历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2001~2015年智利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一直保持在20~35位之间,不仅始终领先于其他拉美国家,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排名靠前^②。另外,根据《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排名,智利近十几年一直稳定在10名左右,居拉美国家之首^③。因此,智利作为一个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是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

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智利充满争议的经济转型过程;第三部分,总结智利成功转型的主要经验和存在问题;第四部分,分析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四种道路以及其背后的政策含义。

二、智利经济转型实践的简单回顾

回顾世界经济史,人们不难发现,由于远离战争,二战结束时智利发展水平并不低。以1962年为例子,智利人均GDP是684美元(时价,下同)^④,不仅高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新加坡(430美元)和韩国(104美元),而且也高于一些发达国家,例如西班牙(519美元)和葡萄牙(407美元)。众所周知,民主政府下有可能出现适宜的长期经济政策,也可能因为民粹主义泛滥而错失发展良机。学界普遍认为,在1961~1973年民选政府时期,智利在经济上没有采取开明的、适宜的市场经济政策,尤其是1970~1973年阿连德执政时期,人民团结阵线(Unidad Popular,UP)“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施政纲领将民粹主义推向了极致,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65~1969年智利平均每年对卫生的投入是1.39亿美元,但1970年上升到1.54亿,1971年是2.12亿,1972年高达2.37亿;住房投入从1965~1969年的平均每年1.34亿上升到1973年的2.30亿(World Bank,1980)。同时,克列尔和萨特也强调,智利在阿连德执政期间,社会保障和家庭补贴等福利项目支出大幅提高,而1970年工资增长幅度高达55%(1969年通胀

^① 2012年,智利人均国民收入为14250美元,首次超过该年高收入国家下限12615美元。因此,从技术上说,智利从2012年开始正式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此外,乌拉圭和阿根廷同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为13910美元和13060美元,也说明从技术上同样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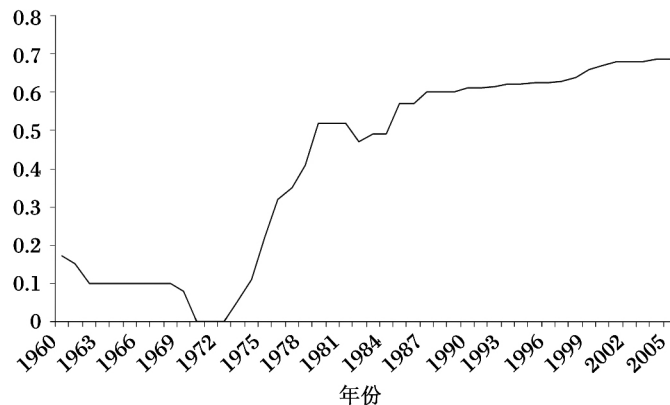
^② 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论坛网站 <http://www.weforum.org>。

^③ 数据通过维基百科搜索得到 <http://wiki.mbalib.com/wiki/经济自由度>。

^④ 下文出现的数据凡是没有给出说明的,均引自世界银行网站 <http://data.worldbank.org>。

率为 33%) ,1971 年 7 月 ~ 1972 年 8 月 ,生活成本提高了 45.9% ,通胀率攀升了 1 倍 ,黑市的埃斯库多 (escudos) 对美元贬值了 1 倍 ,到 1973 年 8 月贬值了 300% ,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 ,对钢铁、油田、炼油、铁路、民航等部门大肆推行国有化 ,通过“生产开发公司”(Productio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对 40% 的生产性企业的股权实行了控制 ,到 1972 年 10 月 ,国家控制的企业多达 400 多个 ,占全国工业产出的 80% ,占全国 GNP 的 60% (Collier & Sater, 2004) 。因此 ,阿连德的经济部长彼得罗·普斯科维克 (Pedro Vuskovic) 1972 年 3 月坦言道,“经济政策的本质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 ,都从属于人民团结阵线不断增加的政治需要……其核心目标就是扩大对政府的支持”。诚然 ,在阿连德下台和皮诺切特政变的背后明显有美国的影子 ,尼克松总统专门为中央情报局安排了 800 万美元的款项 ,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不可否认的是 ,阿连德政府实行的偏离市场原则的经济政策和民粹主义的社会政策已使智利陷入一场空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1973 年 9 月 11 日 ,智利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 ,皮诺切特开始了 17 年的军政府统治。智利军政府对前弗雷政府实行的民粹主义和阿连德政府实行的“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进行了彻底改革 ,实施了一系列“经济结构改革” ,其中包括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 ,主张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等。如图 1 所示 ,几乎所有的结构改革都发生在军政府统治时期。“结构改革指数”是指选取贸易、金融、税收、私有化和劳动力等五个领域的代表性变量并为每一个变量赋值(取值范围在 0 ~ 1 之间)后求算术平均值所得到的指标。构建该指数的前提假设是:经济领域结构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消除那些限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或政策措施 ,降低不合理制度安排给交易或生产活动带来的扭曲 ,使生产性资源配置具有更大效率。正如罗拉所说 ,政府干预越多、市场化程度越低、对国内市场保护力度越大 ,则各个变量的取值越小 ,最终导致结构改革指数越低 ,反之亦然 (Lora 2001) 。



资料来源: Schmidthebbel, Klaus, 2008. “Chile’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Leadership, Policy – Making Process, Policies, and Results.” *Working Papers Central Bank of Chile*. No. 507: 35.

图 1: 1960 ~ 2005 年智利“结构改革指数”变化

1990 年智利结束了皮诺切特长达 17 年的军政府统治。艾尔文总统上台执政伊始 ,智利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政治和社会矛盾。一是军政府统治时期大量惨遭杀戮、失踪、监禁和流放人员或其家属要求惩办皮诺切特和前政府的高级军政要员。二是极左翼势力极为活跃 ,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三是在反对皮诺切特军政府统治斗争中形成的民主联盟各党派之间在价值取向和执政理念上也并非完全一致 ,在一些政策上难免存在着分歧。四是贫富严重分化加剧了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抵触和对立。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将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 ,进而可能导致经济政策的改弦易辙 ,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必然付之东流。但是 ,智利新政府依然延续了前期的市场经济制度。

因此 ,安德森认为 ,尽管 1990 年后历届民主政府都对经济和社会政策做出了适当调整 ,但总的来看 ,智利现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基本上都是沿袭军政府时期的改革成果 (Andersson 2009) ,即使调整也

是在原有制度基础上进行修修补补,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前文关于1960~2005年“结构改革指数”的变化上(这一指数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得到进一步提升)。智利并没有改变已经确定的经济改革方向,而是继续深化和拓展不同领域的改革,较好地继承和保存了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有效地防止了拉美国家常常看到的模式转型的“钟摆现象”——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1990年后智利各届政府仍然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在资本市场改革上。2001年智利政府启动了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①,激励国内储蓄和刺激经济增长。这次改革主要体现在税收、投资体制和养老基金三个方面。其中,税收改革措施主要针对雇员和独立纳税人:一是提高自愿性养老基金缴费的限制,由48UF提高到50UF^②;二是取消通过证券交易所购买的大额股票和证券销售、持有IPO公司股票三年后销售以及证券市场股票和债券卖空的资本所得税。投资体制改革包括:一是放宽对保险公司投资组合的限制,允许它们购买新的投资产品,并且引入新的披露和偿付能力要求,从而放松了对保险业的管制;二是简化股票交易及其标准化资本要求,解除了对共同基金的管制;三是培育新型资产管理机构,允许其管理多种类型基金,包括共同基金、投资基金和抵押贷款公司等。养老基金私有化改革主要是允许养老基金管理者提供五项投资选择(以前只能提供两项选择)。总之,通过这次改革,提高了智利国内储蓄率,深化了资本市场,改善了资本流动性,为企业直接融资提供了便利,促进了银行、保险和养老基金间公平竞争,增强了资本市场的活力。

2003年,智利政府再一次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主要是通过进一步规范和简化资本市场操作来提高智利资本市场竞争力:一是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为了增加风险投资的目标公司,智利政府对一些规模较小的创意性或具有较好项目的企业给予资本所得税的临时免除,同时如果风险投资公司通过持股获得这部分额外收益也将免税;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为了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智利政府对创立有限公司的组织提供便利,以此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并通过国家资产登记平台使中小公司在抵押资产上获得便利;三是改进公司治理标准,主要通过改善政府在信息披露、投票权和关联交易处理、内部交易和监管方面的现有规定,逐步靠近OECD的公司治理标准;四是改善监管和执行,加强对证券业操作风险的控制和信息的披露、提高大额证券交易的信息化水平,提高金融中介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增强股票交易所的自我监管功能等;五是促进自愿储蓄机制建设,增加自愿养老金储蓄计划的选择范围,为雇主和雇员缴费提供便利;六是修改法律条文以便与资本市场改革协调起来。

三、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与问题

(一) 基本经验

1. 经济转型成败与否就在于能否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我们知道,政府主导发展模式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陷阱”并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顺利迈进的主要经验,这种发展模式必然意味着很多企业长期受到政府的过度保护,享受各种优惠政策,成为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最大获益方,随着利益日趋固化,成为政府主导发展模式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但长此以往,这些企业必然经营效率低下,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差,甚至通过低效地挤占更多资源而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当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后,一部分社会精英发现或预见到这种模式终将难以为继,开始推出经济转型措施时,必然会遭到这些既得利益者的极力反对。特别是当推动改革的强权人物在改革未尽时退出历史舞台从而使既得利益集团赢得喘息之时,他们必将阻挠继续改革的步伐,改革的阻力就会越来越大,推进改革的局面就会愈加复杂,此时当政者如果动摇改革,那么已经实施的改革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这也是导

^① 其实,早在1974年和1975年,智利便开始首轮资本市场改革,通过放松对利率和信贷的控制,结束了长达30多年的金融管制。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智利又启动了第二轮资本市场改革,借拉美债务危机之势加强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在增加资本市场的规模、深度和流动性的同时,不断提高资本市场发展的质量。

^② UF的西文全称是“Unidad de Fomento”,直译为“智利发展单位”,即根据通胀率调整的货币单位。

致 20 世纪 90 年代很多拉美国家经济转型难以持久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例如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巴西、尼加拉瓜、厄瓜多尔在进入 21 世纪后,面对各种压力,政治开始向左转,最终摒弃或放慢了经济转型。但是,智利皮诺切特政府通过 17 年的不懈努力,顶住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完成了经济转型,最终成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模范。因此,经济转型就必须持之以恒地长期进行,不能怀疑、松懈、停顿,更不能倒退,目的就在于不能给既得利益集团以喘息和反扑的机会。

2. 威权体制为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经济转型的阻挠提供了机遇。既然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对经济转型如此重要,那么如何突破便成为问题的症结所在。智利无疑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方向,那就是借助威权体制的力量。这当然是充满争议和冒险的答案,特别是在民主诉求日益强烈的今天,势必会触动很多人的敏感神经,冒天下之大不韪。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探讨,即在民主体制下,能否约束住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要知道,民主本身是一种权利制衡过程,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承认和维护,至少不会在短期内打破这种既有利益格局,因此往往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正如温特劳布提及的美国《外交》杂志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谈到亚洲的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时说的一句话“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构建起法律规则、商业体制和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后,才能转向民主”(Weintraub, 2003)。显然,民主是有前提的,即“好”的经济制度,但这又是经济转型的方向所在。因此,至少可以说威权体制是完成经济转型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威权体制可以导致经济制度向好的方向变迁,且变迁后经济制度能够获得新的增长潜力,那么制度变迁会在以后发展过程中得到自我强化,从此使制度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迅速优化。但是,威权体制也可导致错误的经济制度变迁,进而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而导致停滞,甚至顺着错误的路径往下滑。毫无疑问,智利抓住了这个机遇,避免了既得利益集团借助民粹主义力量重新复辟。

(二) 存在问题

1. 经济增长质量虽有改善但增长方式仍需转变。1961~1972年,智利GDP平均增长率仅为3.65%。其中,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分别为1.42%和1.13%,而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为1.10%。显然,这一时期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致相同,说明在资本和劳动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也在同步改善,但问题是这段时期经济增长的速度较慢,说明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一定问题。1973~1989年智利GDP平均增长率为4%。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为2.28%,劳动投入的贡献为1.64%,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为0.08%。这段时期经济增长仍然依赖资本投入的增加,而全要素生产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990~2009年智利的GDP平均增长率为5.26%。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为2.97%,劳动投入的贡献为1.33%,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为0.96%^①。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虽然GDP增长率较高,但主要是由资本推动的,而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并不十分突出,因此,就这一时期而言,经济增长的质量还有待提高。当然,与1973~1989年相比,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有了大幅提高;而与1961~1972年对比,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得益于资本投入的快速提高,而全要素生产力并无太多改善。另外,世界经济论坛还认为智利经济正处于由效率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过渡的时期。综上,还政于民20年,智利经济增长确实有所改善,但还需进一步转变增长方式。

2. 教育质量有待提高。在皮诺切特执政时期,智利政府对教育制度进行了部分私有化改革,其中中小学由三类构成:一是公立学校,由市政府进行分权化管理;二是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三是完全个人付费的私立学校。改革本来是想通过教育的部分私有化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多渠道募集资金,以期实现在削减财政支出的同时,不断提高各类学校的入学率和教育质量。但实践证明,富裕家庭的子女往往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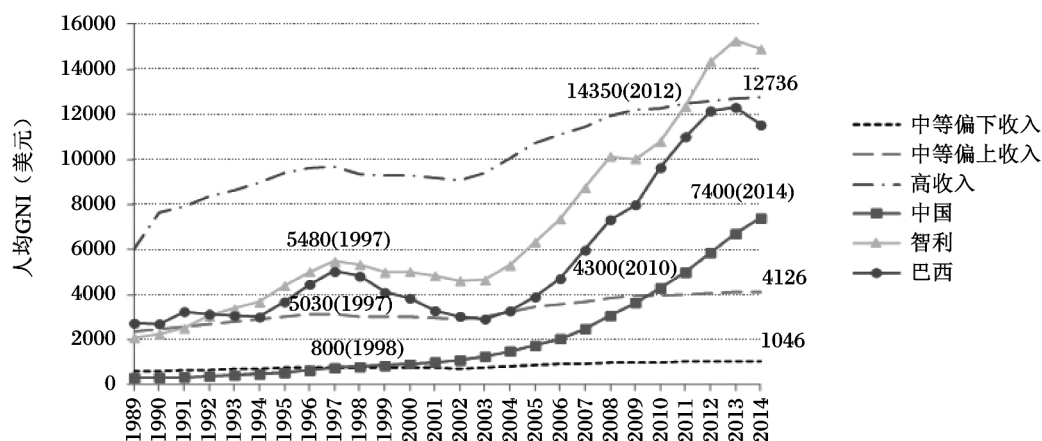
^① 数据为作者计算得出。劳动投入数据来自智利中央银行公布的经济统计指标, <http://www.bcentral.cl/eng/economic-statistics/series-indicators> 和 Rodrigo Fuentes, Mauricio Larraín, Klaus Schmidt-Hebbel, 20006. “Sources of Growth and Behavior of TFP in Chile.” *Cuadernos de Economía*. Vol. 43: 113-142; GDP和资本投入数据来自World Bank, *WDI Online*, 2010. <http://ddp-ext.worldbank.org>。且均以200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

选择私立学校,导致教师和教学设施等资源不断向私立学校倾斜,而智利政府采取的教育券制度不仅没能保证贫困家庭子女进入私立学校(家庭收入太低无法承担进入私立学校的其他开支),实际上等于穷人被迫放弃了这部分财政资助,而只有富裕家庭子女才真正享受到这种财政补贴。另外,学生成绩又与家庭收入相关,因为家庭收入往往决定了学生能否进入教育质量相对较高的私立学校,由此导致大量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只能进入教育质量低下的公立学校。总之,正如德谢佐所说,这种学校教育质量的差异和机会的不公平使得贫困家庭很难走出贫困循环(DeShazo, 2005)。因此,智利教育制度改革是不太成功的,这就进一步限制了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甚至成为继续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的障碍。

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道路选择

在经历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艰难岁月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陷入经济衰退,而中国经济却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续写着—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奇迹。但也不可否认,这几年经济运行中诸多风险和隐忧开始出现,比如外需持续低迷、内需依然不振、产能过剩突出、地方债务加剧和企业杠杆高企等等。以往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不断被压缩,效果日趋弱化。显然,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正由过去的周期性向结构性问题加速转变,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呼声再起。

与此同时,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GNI)达到4300美元,正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社会(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中等偏上收入下限为人均国民收入3975美元)。到2014年底,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迅速攀升到7400美元,不仅显著高于该年中等收入下限1046美元,也明显高于当时的中等偏上收入下限4126美元,但距离进入高收入社会的门槛(2014年的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12736美元)还有较大距离。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大概位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中间偏下位置,类似智利和巴西1997年所处的位置,这正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出现停滞,并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敏感阶段和关键时期(图2)。因此,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担心开始在网络和媒体上频频出现,并引起了广泛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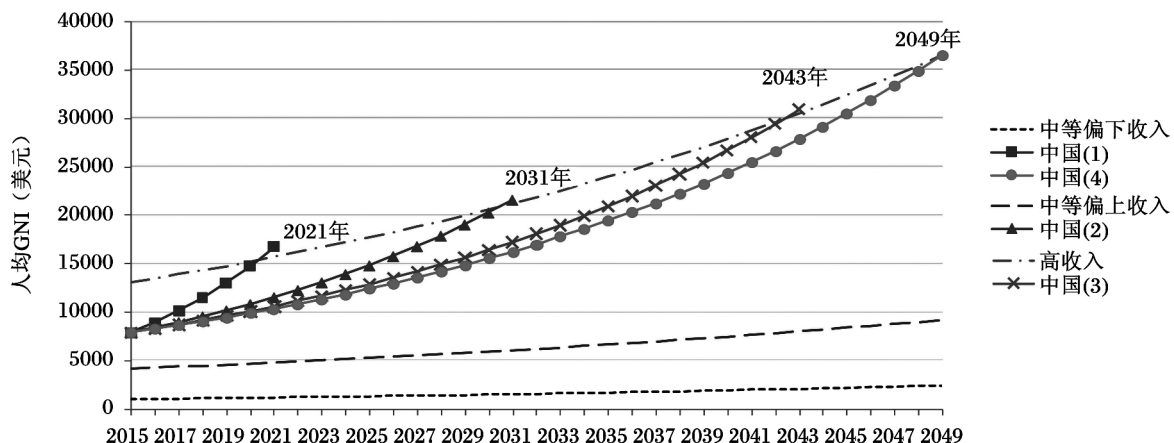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

图2:1989~2014 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情况

如引言所说,既然“中等收入陷阱”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中国是否需要担心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呢?或者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当然,对一个经济体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做出事前判断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世界银行只给出了一个描述性概念,既没有给出经济体将要或正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预警,也没有规定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多少年就可以视作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等事实成立已经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但是,这个问题又不能回避,因为如果真等到几十年后发现中国已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那时或许只能望洋兴叹、于事无补。因此,中国至少不能回避这种可能性。

智利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来说,必须居安思危,尽早重视并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微观市场制度变革,提升市场效率,而不能盲目崇拜短期的GDP,也不能固守趋势性思维,认为未来一定是过去的延续。应该说,中国的经济转型是渐进式改革的一部分,但前些年这种改革确实遇到了不少阻力,制定出来的各种改革措施往往得不到有效执行和贯彻。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陆续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简政放权和减税降费以及正在落实的国有企业改革等,不仅意味着降低企业负担和激发市场活力,更重要的是把要素配置的权力还给市场,通过市场的力量逐渐纠正一些扭曲的价格信号,重新配置要素,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短板”。同时,考虑到人口现状和经济的长远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得到调整,“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继续推进改革,中国就完全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在进入高收入社会之前,我们必须对未来发展形势有所判断,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合理规划短期和中长期发展目标。根据世界银行制定并于1989年推出的收入阶段标准,每年都有相应提高,到2014年,中等收入偏下、中等收入偏上和高收入标准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39%、2.30%和3.06%。假如这种增长趋势保持不变,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到未来各年的相应收入阶段标准。进一步,假定未来中国人均GNI(以美元计价)增长率有以下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延续1989到2014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13.39%),那么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间就是2021年;第二种情况是保持目前增长率不变(6.5%),那么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为2031年;第三种情况是进一步降低中国的增长预期,比如5%,那么进入高收入社会的时间就是2043年;第四种情况是先把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设定为2049年,也就是中央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最终奋斗目标,那么前提是保证未来30多年以美元计价的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不低于4.61%(图3)。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并绘制。

图3: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道路选择

中国到底会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或者选择四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呢?换句话说,我们目前应该是追求GDP高速增长,还是把重心放在改革上(特别是二者不能兼得的情况下)?这不仅需要中央政府的决心和勇气,而且更需要担当和智慧。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希望及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也要避免急功近利,特别是不能以短期增长目标牺牲长期增长潜力。因此,关键是摆正心态,正确看待经济转型和短期增长之间的矛盾。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至少在未来10年,中国经济是有条件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但之后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21世纪30年代)的到来,中国经济才将面临真正考验。也许给我们的唯一出路和仅有的时间窗口,就是未来10年进一步容忍经济增长放缓,从而腾出更多空间破除万难,大力推进结构改革。

参考文献:

- 王晓燕 2004 《智利》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Andersson , M. ,2009. “More to the Picture than Meets the Eye: On the Ultimate Causes behind the Chilea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 *European Review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No. 86: 21 – 37.
- Collier , S. , and William F. Sater ,2004. *A History of Chile ,1808 – 200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Shazo , P. ,2005. “Chile’s Road to Development ,1990 – 2005. ” *CSIS Policy Papers on the Americas*. 16(2) : 1 – 18.
- Lora , E. ,2001. “Structural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What Has Been Reformed and How to Measure It. ”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No. 466: 1 – 52.
- Pritchett , L. , and L. H. Summers ,2014.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 *NBER Working Papers*. w20573: 1 – 35.
- Schmidthebbel , K. ,2008. “Chile’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Leadership , Policy – Making Process , Policies , and Results. ” *Central Bank of Chile Working Papers*. No. 507: 9 – 49.
- Weintraub , S. ,2003.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media/csis/pubs/issues200311.pdf.
- World Bank ,1980. “Chile – 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645231468769210794/Chile-An-economy-in-transition>.

Avoiding the “Middle – Income Trap” : Chile’s Path and Experience

Qi Chuanjun

(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middle – income trap not only exists in reality , but also has a theoretical basis. Chile’s experience shows that when the economy grows to a certain level ,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This requires a relatively strong government to break through obstruction by vested interests , consolidate good systems , and form a new path dependenc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for China , in order to avoid the middle income trap , accelerat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ill be inevitable in the future. But at the same time , it is essential to judg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choose a suitable road through rational planning.

Key words: Middle – Income Trap;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Vested Interests; Chile

(责任编辑: 刘 英)